

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浙江教育改革开放 30 周年回顾

（代序）

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 浙江省教育厅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马克思主义勇气和义无反顾的精神，在 960 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上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引领着中国人走上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30 年来，因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0 年来，因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浙江由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农业省份和资源小省一跃跻身全国经济大省行列。30 年来，因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浙江教育铸就了骄人的业绩。

30 年前，浙江省连初等教育都没有普及；30 年后，全省基本普及了从学前三年到高中阶段的十五年教育，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先进的省份之一。

30 年前，浙江省能读大学的人凤毛麟角；30 年后，全省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普及率最高的省份之一。

30 年前，浙江省的职业教育非常薄弱；30 年后，全省的职业教育在高中教育阶段已经两分天下有其一，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在高等教育阶段三分天下有其一，成为全国职业教育最健康的省份之一。

30 年前，浙江省的成人教育几乎只有“扫盲”的概念；30 年后，全省已经形成了包括学历教育 and 非学历教育的完整的成人教育体系，成为全国成人教育最有效益的省份之一。

30 年前，浙江省中小学校舍普遍破旧不堪，有限的几所大学大都是袖珍大学；30 年后，一所所现代化幼儿园、中小学成为城镇、乡村最靓丽的风景，一所所崭新的万人大学拔地而起，成为全国校舍建设最好的省份之一。

30年前，浙江省支撑着中小学教育的主要力量是民办教师、代课教师；30年后，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和高学历率均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全国教师队伍建设最好的省份之一。

30年解放思想，30年改革开放，30年栉风沐雨，30年灿烂辉煌。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的浙江教育人，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走千山万水，历千辛万苦，在姹紫嫣红的教育园地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和喜悦，累积了一个又一个认识和经验。

一、30年来，浙江教育不断冲破旧的观念束缚和旧的发展方式，在种种艰难险阻中昂首挺进。

——冲破极“左”思想的束缚，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教育是首当其冲的领域之一。停课闹革命、交白卷是英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搞乱了整个教育系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不断肃清“左”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推翻“两个基本估计”，把教育的功能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以恢复高考为契机，整顿高等教育秩序；以普及初等教育为抓手，恢复中小学基本学制和课程，并恢复了停办的技校和中专。“文革”中被彻底打破的教育秩序迅速得到恢复，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恢复了过来。

——冲破单一的办学体制，实行多元化办学。30年前，我省教育基本上处于政府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起的状况。30年来，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导，我省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大大加快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速度。省政府制定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民办中小学发展的文件，出台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规定》，社会力量办学如雨后春笋，非财政性投资的民办中小学应运而生，民办二级学院和民办高职院校相继问世，快速扩大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规模，为人民群众希望接受更多、更高、更好的教育提供了机会。

——冲破原有的教育架构，构建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30年前，浙江的教育框架基本上是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非常薄弱，高等教育规

模很小，成人教育仅有“扫盲”。30年来，我们从普及初等教育开始，开启了以“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阶段的十五年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为基本格局的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已基本形成。

——冲破旧的教育教学模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教育而教育、为应试而教育，一块黑板一本书、一支粉笔一群人，是30年前教育的基本状况。30年来，我们不断冲破这种旧的教育教学模式，进行着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从1987年9月开始，我们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以“基础教育和人的现代化”为主题的“柯桥实验”；1997年，我们开始素质教育实验县工作；1998年，我们进行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引起全国关注；2002年，我们在余杭、北仑、义乌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国家试验，2004年在全省推开。此外，推行了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中考制度改革、“3+X”高考、学分制、弹性学制、小班化教育实验、重点高中将招生名额分到初中等多项改革措施，形成了多形式推进素质教育的工作局面。

——冲破封闭办教育的状态，扩大对外开放。30年前，我们不了解国外的先进教育文化，学校几乎没有外籍教师，很少有学生出国留学。30年来，我们不断吸纳世界先进教育教学成果，“多元智能理论”、“蒙台梭利教学模式”、“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等先进教育文化，为浙江的教育教学注入了活力。走出国门留学不再是少数人的梦想，招收海外学生来浙江就学也不再是天方夜谭。此外，到国外创办孔子学院，跟国外名牌大学合作办学、办项目，引进国外名牌大学到浙江办学，聘请众多的外籍教师到浙江任教，派遣学者到国外学校讲学等，使浙江的教育格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开放态势。在国内，面向社会办学渐成常态。产学研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已成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办学的必然途径。开放为教育搭建了更为坚实的平台，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冲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保障教育公平。30年前，因为家庭贫困，众多的适龄儿童少年无法上学；因为制度限制，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无法就学；因为办学理念陈旧，很多所谓的问题学生被迫放弃学业。30年来，我们采取“扶贫助学”、“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改革学籍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举措，决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不能接受义务教育，决不让一个大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决不让一个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不了学，决不让一个所谓的问题学生被迫放弃学业，有力地促进了十五年基础教育的基本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力地促进了就学权利的公平。

二、30年来，浙江教育不断创立新的成长平台，在跨越发展中一次次收获喜悦。

——教育普及程度显著提高。30年前，浙江的孩子读书很难。而到1989年，我省所有县（市、区）实现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到1997年，我省成为全国第三个通过国家“两基”总验收的省份；到2004年，我省成为全国省区中第一个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十五年教育的省份，普及率达95%以上。30年，三大步，确立了浙江基础教育在全国的持续领先地位。同时，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重大跨越。30年前，全省只有普通高校20所，普通本科、专科生只有2.4万人，研究生只有321人，高考录取率不到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1%，高等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如今，全省普通高校达77所，普通本科、专科生达83万人，研究生达3万余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以上，居全国省区第一位。

——教育布局显著优化。30年前，浙江中小学规模小、布点散、效益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地方甚至是“一个教师，两张桌子，三个年级，四个孩子”。与此相反，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又过于集中在省城杭州。30年来，我省花大力气优化教育布局，全省小学从4.45万所减少至4813所，校均规模达到697人；初中从2341所调整到1801所，校均规模达到997人；普通高中从1756所调整为603所，校均规模达到1444人，办学效益明显提高。在高等教育领域，依托

六大高教园区的杭州、宁波、温州三大省域高教中心已经形成，全省其他设区市基本形成“一本一专”或“一本多专”的高校设置格局，昔日的袖珍大学已普遍发展成为万人大学。

——教育体系显著完备。改革开放 30 年，全省教育体系更加健全和完善。学前教育体系逐步健全，学前教育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特殊教育渐成体系，特殊教育学校由 7 所增加到 63 所，在校生数由 1191 人增加到 1.3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由弱变强，30 年前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招生人数比为 1：13，2001 年以来普职招生与普高招生人数比连续八年保持 1：1。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目前高等职业学校已达 45 所，其中 6 所进入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行列，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全省本科、专科在校生的 1/3 强。成人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省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由 1639 人增加到 30 余万人，目前远程教育在校生达 4 万余人，近 200 万人次参加各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证书的自学考试。

——办学条件显著改善。30 年前，全省中小学危房、破旧校舍比例分别达 15%、33%。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扶贫建校、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新建迁建扩建等举措，基本消除了危房和破旧校舍，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全省各级各类学校面积成倍扩大，普通中小学校舍面积达 6083 万平方米，中等职业学校校舍面积达 980 万平方米，普通高校校舍面积达 2584 万平方米。生均用地面积，小学为 17.6 平方米，普通中学为 34.1 平方米，分别比 1986 年增加了 8 平方米、18.9 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小学为 6.7 平方米，普通中学为 14.4 平方米，分别比 1986 年增加了 3.1 平方米、10.2 平方米；高校生均校舍面积为 33.2 平方米，比 1981 年增加了 3.3 平方米。生均仪器设备值，小学为 555 元，普通中学为 1289 元，高校为 10161 元，均为 2003 年的 1.5 倍。

——师资队伍不断加强。目前，全省从幼儿园到普通高中的教师的学历合格率达到 96% 以上，小学专科及以上、初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分别达到 79% 和 72%。职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达到了 87.9%，其中“双师型”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20.8%和 49.3%。普通高校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占 39%，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高。

——教育开放显著扩大。30 年间，我省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增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近 1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 7000 多人，回国率达 70%以上，一大批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已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型省份的重要生力军。来浙留学教育快速发展，1978 年我省留学生仅 10 多人，目前长期在我省学习的留学生达 7500 多人，在我省工作的外籍教师 1100 多人，我们还在全国率先建立 7 个留学生教育基地。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我省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达 91 个，20 余所高校与国外高校签订学分互认协议。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取得新进步，我省高校已在海外建起 8 所孔子学院。我省于 2005 年创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创办的高校。此外，我省还实现了与港澳台地区从无到有、从局部到整体的全方位教育交流。

三、30 年来，浙江教育不断深化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认识，在与时俱进中积累宝贵经验。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30 年来，我们始终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牢牢抓住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把握教育发展的突破口，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普及初等教育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压缩普通高中、稳定初中规模、确保小学重点”的方针，保证了初等教育的快速普及。在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活两头（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保中间（义务教育）、促全局（整个基础教育）”的策略，既确保了义务教育这个重点，又为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在财政无法全面保障教育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积极性，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在教育的外延扩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我们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内涵为主的发展思路；在基础教育发展不够均衡的情况下，我们实施了标准化学校建设和“四项工程”；在职业教育发展力度不够的时候，我们出

台了“六项行动计划”；在高等教育落后于全国的情况下，我们大力推进高教园区建设和独立学院、高职院校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为浙江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坚持敢于争先。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教育并非处于全国前列，尤其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大大落后于先进省份。改革开放之后，浙江教育人敢于想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敢于做别人没有做的事业，开创了敢于争先的浙江教育发展局面。基本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全国第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全国第一，高教园区建设全国第一，民办大学创建全国第一，兴办独立学院全国第一，创办中外合作型大学全国第一，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与普通高中招生 1:1 全国第一等等，成就了浙江教育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坚持尊重群众的创造。民心无价，民智无限。浙江教育发展的实践证明，没有群众的首创精神，不会有浙江教育的大好局面；没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氛围，也不会有浙江教育的大好局面。湖州的德育导师制，课外文体活动的“东阳模式”，绍兴实验中学的“轻负担、高质量”，堂头中学的生活德育，教育均衡发展的“北仑经验”，温岭重点中学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初中的办法，宁波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警机制，长兴的“教育券”，特殊教育的“靖江模式”，新昌中学的“创新教育”等等，无不充分体现了经验来自于基层、创造来自于群众。

——坚持为人民办教育。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以满足人民对教育的期待为宗旨，坚定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推进“教育强省”建设，把教育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石”，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浙江在全国最早喊出了“决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不能接受义务教育，决不让一个大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口号。通过落实全面改造危旧校舍，全面实施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农村中小学爱心营养餐工程、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和农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和课本费，全部免除符合条件的外来民工人员子女借读费，全面建立大中专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积极开展农村预备劳动力培训等一项项举措，坚持为人民办教育，使教育在全省改善民生、提升民力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勤劳智慧、敢为人先的浙江教育工作者在过去的 30 年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相信，在新的时期，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推进教育的科学和谐发展，我们就一定能让浙江教育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目 录

改革创新篇	1
“柯桥实验”的回顾与反思	1
栉风沐雨 创新为先	7
寻求发展农村教育的突破口	18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27
集社会之力 兴千秋大业	35
建立成人扫盲教育新体系的探索	40
常山农村中小学改水工程纪事	48
实行教育倾斜 构建和谐校园	58
一所家门口的世界名校	62
在改革中前行的龙湾教育事业	66
发展历程篇	68
历史的丰碑	68
改革开放 30 年杭州教育发展回顾	81
从“园丁新村”到“小康之家”	84
春风喜雨润“学军”	93
改革开放成就了宁波大学	97
董建华与舟山航海教育	103
我见证了宁波高教园区的崛起	107
从“不像学校”到“像学校”，再到“既像学校又不像学校”	109
百年树人，海外侨胞功不可没	113
开启新篇章 谋求新发展	115
改革开放的宁馨儿	118
民主治校 接轨企业 改革创新	122

“双薄”区域 30 年校舍的变迁	127
创建·改革·发展	130
从小石子到多媒体	134
见证	138
开化排除学校危房见精神	142
临海放歌 云水长和	144
30 年，我一路看过	148
“塑模”见证大成中学巨变	150
腾飞 30 年 收获 30 年	152
我和“爱心营养餐”	156
忆历历前尘 颂改革开放	159
与改革同行	162
办不下去的“弄堂大学”	165
理性思辨篇	168
学院的力量	168
我印象中的民办教育	171
30 年来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	178
从一项调查看农村女性教育地位的变迁	182
观念创新成就浙江高教大众化先发优势	185
教师团队：教育改革开放 30 年的一张名片	189
临海教育巨变	192
依法护航校园安全	195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竞风流	198
彰显人文 与时俱进	202
浙江省义务教育均等化之路	206
感性回忆篇	210
快乐地“下岗”	210
往事	213
同胞情 回归心	218

永恒的梦想 永恒的情怀	224
我与母校一起成长	228
四件宝，陪伴我与师大共成长	232
30 年读书路	235
三个“同年佬”的故事	240
30 年岁月，我与教育共成长	243
曹老师的自行车	245
乘改革之翼，翔长空万里	247
祠堂·新舍·空楼	252
从祠堂古庙到琼楼玉宇	254
风云卅载“气象”新	257
话农村学校 30 载 点滴变化在心头	260
回望山野之间的那条路	262
两个共和国同龄人的忧和乐	265
在岁月中“蝉蜕”的历程	266
一所学校的三次变迁	269
一个政策 一种命运 一份幸福	272
我这位农村教师所经历的教育巨变	274
母亲的生日感慨	277
附录	280
编后语	286

改革创新篇

“柯桥实验”的回顾与反思

原浙江省教委主任 邵宗杰

一、简要的回顾

1987年8月，浙江省教委决定，在时辖9个乡镇、约14万人口的绍兴县柯桥区组建农村区域教育改革实验区，建立相应的课题组、实验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以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积极适应、服务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以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教育的典型经验和模式为目的，开展教育实验，简称“柯桥实验”。“柯桥实验”从整顿学校教育秩序、改善校园氛围和改革中考办法入手，进行多方位的改革尝试。整个实验持续了八年。

为期八年两轮实验，使柯桥区70多所农村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办学特色；校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学校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学校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形成了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学习由苦事变成乐事，学校变得生动活泼而有吸引力；小学和初中的流失生绝迹，已辍学流失的学生也重返校园；毕业生对现实生活的适应、生存和发展能力比过去明显增强，一个粗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学校群涌现于柯桥。

1990年7月和1996年4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邀请以张健和卓晴君两同志为组长的专家组，对课题进行了两次鉴定。经过鉴定，专家组对实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在1996年4月19日的会上说：“这项教育改革的实验非常成功，有很重要的突破。这是一项在柯桥70多所中小学进行的教育改革实验。从全国范围来讲，农村基础教育改革是一个薄弱环节。区域性的突破不多，所以说是很难得的。”“有突破意义的是双向参与机制的初步形成。”“唯应试教育是一直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叶圣陶先生写过文章，反对题海战术，提出‘救救孩

子’。教育主管部门说了许多话，发过的文件不知有多少，但是情况依然如故，或者说面在扩大。开始是高中，然后是初中、小学，直到幼儿园小学化，有些地方愈演愈烈。”“‘柯桥实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行，取得了初步突破，获得了成功，所以说难能可贵。从全国来讲，不敢说唯一，但是很少。它给我们一种希望，表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然开始从事这项实验工作的时候，我想恐怕也担着一点风险。”

1996年，“柯桥实验”成果结集成书，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30多万字的《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农村区域教育实验》一书，从总体上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柯桥教育实验区探索的足迹。

二、“柯桥实验”的特点和支撑它的若干信念

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消除它所造成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后果，是我国基础教育界一场屡战屡败又不得不打的持久战。公众在大众媒体上的呼吁，教育行政机关的文件，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批示、讲话，多得不可胜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原浙江省教委曾把全省市、县两级正副教育局长分批请到杭州，分10期进行培训，和他们一起学习、讨论、讲道理，但所得到的回应是：“你们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我们下面实际行不通，‘上合天意，下违民心’，你们来搞搞看，先做出个样子来吧！”所以，“柯桥实验”上马时，课题组同志的心情，多少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

那么，是哪些观念，或者说信念指导、支撑着课题组进行这一农村教育改革的区域实验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坚信，在农村中小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中，蕴藏着进行教育改革的积极性，课题组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努力，一定会得到他们的赞成和积极参与，决不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最了解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其中也不乏富有经验和改革精神的校长和教师，只要把他们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他们参与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和热情充分调动起来，教育改革不是不可能的，应该并且完全能够依靠他们实现新农村教育模式的探索。实验的结果也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柯桥的广大校长、教师至今说起实验，无不自豪地说“我们是‘土八路’搞的实验”、“我们是实验的第一主人”。一线的校长和教师是实验的主力军，成为“柯桥实验”的一大特色。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最大受害者是农村、社会和国家，直接受害者是学生；教师、校长和学生家长，看似“加害者”，其实同是受害者。大家的手脚和头脑，都被辅之以种种所谓的“激励”措施的频繁统考和分数排队捆得死死的，分数成了与教师、校长乃至教育局长的盛衰荣辱以及家长的期盼和人格尊严相关的“命根”。手段变为目的，工具异化为蛮横的统治者，“考试”和“分数”使大家都成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奴隶，违心地做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蠢事，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乃至社会各界中，客观上蕴藏着改革农村教育、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危害的强大动力和内在积极性，这是教育的动力之源，也是改革的依靠力量和主力军，决不是改革的阻力。我们所做的只是让他们从这个“考分和分数排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因此，“柯桥实验”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在实验区内取消统考，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分数排队，进而对课程教材、教学管理和中考办法等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其次，我们坚信，人是环境的产物，农村教育改革要着力于学校的氛围和文化的改善、创造及建设。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论断给了我们理论支持。

当时，柯桥地区的学校和其他地方一样，“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被谁信任”。教育局局长介绍经验，说学生成绩好、分数高，市（县）长就可能插问：谁出的卷子？谁改的？任课教师不能自己命题，不能自己监考，不能自己批卷，甚至本校所有教师、校长都不得直接参与，怕教师、校长“放水”。我们的学生、教师、校长乃至教育局长，就生活在这样“被谨防、不信任”的氛围中，这不仅极大地扼杀了师生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对师生品德和心理健康层面的消极影响更不能低估。我们认为，只有在和谐、信任、友爱的生活环境中，少年儿童才可能成长为堂堂正正、心理健康的人；校长、教师只有在能够感

受到自己是被充分信任、得到充分尊重的情况下，才可能主动发挥创造精神。所以，“柯桥实验”从开题之日起，就着力在实验区内创造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即：“教师要相信和尊重学生，坚信没有一个学生是不想学好的；校长要相信和尊重教师，坚信没有一个教师是不想把学生教好、不想把班级带好的；教育局长要相信和尊重校长，坚信没有一个校长是不想把自己学校办好的。”同时，把命题、批卷和评分权统统还给学校，还给教师，实行“谁教谁考”的原则，让任课教师自己命题，自己监考，自己阅卷，自己评分，使考试重新回到从属于教学、服务于教学的地位，让它充分地发挥鼓励学生和帮助教师了解情况、改进教学的作用。其结果是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学生们过重的课业负担大为减轻，学校生活又变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学生个性得到尊重和培养，上学读书重新成为学生向往的乐事，包括曾经以跳楼、喝农药相抗争的几个已辍学学生在内的流失生，纷纷重回学校完成学业。

第三，我们坚信，农村教育改革不能关着门搞，务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并进。管理体制过分集中、封闭和机械划一，使农村学校严重脱离了快速发展的农村社会实际，对自己周围社会发生的变化缺乏了解，难以主动作出反应。柯桥地区的广大教师和校长们，在接受了农村学校应当发挥适应、服务、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一观念以后，纷纷探索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吸收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参与学校管理，建立学校、社会双向参与机制的具体途径。他们先向社会开放学校，吸引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到学校来听课和参加某些活动，并形成制度，使社会了解学校在教什么、学生在学什么，是怎样在教、怎样在学，知道现在学校里师生是怎么工作学习的、是怎样生活的，然后请他们对学校工作提改进意见和建议。接着，建立了家长委员会和校董会制度，学校试行县教委和校董会双重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委员和校董们来自各行业、各阶层，他们不仅热心教育且多是有识之士，他们定期举行会议，听取校长的工作报告，与校长一起商量和决定学校的大事。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都是由

校董会提出，由校长付诸实施的。实践表明，通过建立校董会或者其他类似的形式来吸收社会贤达参与学校管理，对于改进现行的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具有突破意义。学校教育要适应、服务和促进社会发展，学校和社会双向参与途径的探索取得初步突破，是“柯桥实验”所提供的最宝贵经验之一。

第四，我们坚信，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教学改革。教学改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师在教什么，学生在学什么”，即课程问题；另一个是“教师怎样在教，学生怎样在学”，即教学法问题。而前者比后者更具决定意义。

“柯桥实验”并不试图产生一套完整的适合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计划、大纲和教材，只是探索改变“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毛泽东语）的可能与途径。而推进课程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排除源自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种种干扰，建立正确的教学价值观，明确应该用怎样的价值尺度，来选择哪些知识、技能进入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

长期以来，指导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的，是不断强调“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所谓“双基论”。基础教育课程重“双基”，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长期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冲击下，“双基”的范围越来越窄，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基础教育的价值似乎只在于升学，似乎仅仅只是为上高等学校打基础、做准备，“双基”则只是各学科继续深入学习的逻辑基础；进而又进一步蜕变为基础教育的教学工作，乃至一切活动，都以能否通过高一级学校招生考试作为价值标准，这是导致教学脱离社会生产、生活实际，脱离学生实际的根源。这个被极度扭曲了的教学价值观，由学校逐步扩散到社会，进而又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得到不断强化。推进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就要转变这个被扭曲的教学价值观。为此，在引导校长、教师认识“双基论”片面性的同时，我们强调：基础教育的功能重在“教人做人 and 教人做事”；与此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自然应被选择为基础教育学校教学的内容。这样就把“双基”的含义扩大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最常用、最必

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把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基础的“双基”，与作为现代农村居民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最有用、最必需的“双基”归并起来，其重合部分作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最有价值、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重合的部分则有选择地纳入教学内容，有的列为一般的要求，有的列为选修的内容，并以此来指导浙江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

第五，我们认为，影响学校教育的因素很多，非常复杂。作为区域实验，要在该区域范围内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消除其恶果，不仅需要诸如严禁频繁统考和分数排队，特别是改革高一级学校招生办法等强有力的行政措施，而且要有切实的监督，保证这些措施的实际执行（尤其是在实验前期的几年），更需要思想上的引导，在实验区范围内上上下下（包括该区域上一级的主要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取得办学指导思想的基本一致和教育、教学价值观的认同，而且，区域范围不能太小，孤立的一所或几所学校，是难以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特别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和诱惑的。三者缺一不可。“三管齐下”是“柯桥实验”能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经验和特色之一，也是坚持、发展和进一步推广柯桥经验所需要的条件。